

我国中小商业银行发展逻辑探析

□章忠诚 许文彬

(厦门大学金融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文章立足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深入分析了我国中小商业银行发展的深层次逻辑。文章首先分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性以及实现该模式所必不可少的国有银行支持和金融体系抑制;进而分析了当体制外成分的内源性增长达到上限时,为促进整体改革在持续增长的条件上顺利展开,金融深化成为必要,这构成我国中小商业银行新发展的根源;最后,文章阐述了金融深化实际展开及中小商业银行具体发展的过程。

关键词:中小商业银行; 金融深化; 发展逻辑

中图分类号: F830.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740(2004)07-0014-03

银行规模的大小受各方面条件限制,尽管现代经济环境下大银行相对小银行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小银行仍存在比较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个一般性的结论在我国的客观环境下同样适用。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我国正处在一个宏伟的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之下,任何制度结构的变化都受制于这一大背景,中小商业银行的出现和嗣后的发展轨迹,同样不能例外。

一、渐进式改革的金融支持和国有银行

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它通过暂时保证体制内经济成分(国有成分)的优势地位和稳定来稳定宏观经济局势,同时通过体制外(非国有成分)的增量创生和发展来为改革创造收益;这一收益经由国家控制的财政金融系统进行了再分配,从而使整个社会各经济部门几乎都能分得一份,于是整体改革就实现一种“准帕累托”式的多赢局面。这种改革的方式可将继续改革的阻力削减到最小,既实现了整体政治经济格局的稳定,也达到了经济增长和体制逐渐转轨的目的,避免了苏联、东欧国家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普通L形下降态势。应该说,从目前看我国这一改革战略是十分成功的,而这一成功与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体制内(增量)经济成分的稳定发展是我国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而这一点则是通过政府通过各种渠道继续不断地给予国有企业补贴来实现的。一般说来,主要渠道有两种:财政补贴和金融补贴。据统计,在1985~1994年间,通过财政预算渠道给国有企业的各类补贴平均约占GDP的5.63%。国有企业从国家财政那里获得补贴,原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财政收入急剧下降(1978年财政收入占GNP的34.8%,到1991年同比下降为18.5%)^[1]。这直接影响了财政补贴的力度:1985年财政补贴占GDP的7.5%,1994年这一比率下降为2.2%。随着国家财政实力的下降与国有企业稳步发展所需资本数量的增加,资本供求产生越来越大的缺口,由国有商业银行向国有企业提供金融补贴于是成为填补这一缺口的唯一渠道。改革以来的金融补贴大致可从以下三方面考察^[2]:第一,据世界银行统计,在1985~1994年间,以低利率信贷和未归还本金形式提供的金融补贴占GDP比重平均为1.72%,这是金融补贴的最直接形式。第二,在国家财政

给国有企业的各类补贴中,已经包含一部分金融的贡献,因为国家财政直接从垄断的国有银行那里获得大笔金融支持。1987~1995年间中国公共部门(包括政府预算与国有企业)的赤字平均占GDP的11.16%,而通过金融渠道融资占GDP比重高达7.09%。第三,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过度负债和大量不良债权事实上属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隐性金融补贴。综合考虑以上三方面因素,在1985~1996年间,国家对国有企业的金融补贴占GDP的平均比重达到9.7%。

要实现国有部门持续不断地获得金融补贴,必须保证国家对商业银行系统的绝对控制,并维持一个比较低的金融深化速度(体现为单一的金融机构组成和单一的金融资产组成),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国民收入中向居民倾斜的那一部分能以储蓄存款的形式流向商业银行,也才能保证商业银行的这一类日益扩大的资金来源能有效地为国家所控制。更具体地说,由于金融约束政策的实施,国内金融体系极不发达,金融机构单一,金融工具极为短缺,人们在金融市场上面临唯一的选择:储蓄存款成为人们储存财富的唯一方式,这保证了商业银行持续不断的资金来源增长(负债增长)。从某种意义上看,商业银行持续不断增长的负债正是改革取得的收益的主要表现形式,必须将这一收益在各部门(尤其是体制内部门)进行分配,才能保证渐进式改革的稳定性,减少体制内成分(亦即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形成的潜在阻力,这就要求政府对商业银行系统的绝对控制。只有通过这一方法,才能方便地为国有企业和财政赤字提供金融补贴。于是,国有商业银行对信贷资金的垄断就是必需的,而市场化导向的商业银行经营模式就必须受到抑制。因此,“国有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本身无疑是嵌在渐进改革逻辑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2],国有商业银行的长期垄断和盈利性商业银行转变和创生受到抑制就成为改革初期的必然选择,这是渐进式改革的逻辑决定的,也是金融深化发展合理次序安排的要求。

二、体制外增长的继续和中小商业银行的创生

如前所述,渐进式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得力于两个因素:体制内成分的稳定和体制外成分的增长,后者为改革继续进行提供了直接的利益动力。因此,要实现改革的继续推进,体制外成分的增长(即所谓的增量改革)是必不可少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制外成分增产呈现稳步上

升趋势,成为支撑改革继续进行的主要动力。参见表一。

表一 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工业产出比重走势:1978~2000年(%)

年份	体制内	体制外	体制外 I (集体企业)	体制外 II (私有企业)
1978	77.63	22.37	22.37	—
1979	78.47	21.53	21.53	—
1980	75.97	24.03	23.54	0.49
1981	74.78	25.22	24.61	0.61
1982	74.46	25.54	24.82	0.72
1983	73.36	26.64	25.74	0.90
1984	69.08	30.92	29.71	1.21
1985	64.86	35.14	32.08	3.06
1986	62.26	37.74	33.52	4.22
1987	59.73	40.27	34.62	5.65
1988	56.81	43.19	36.14	7.05
1989	56.06	43.94	35.69	8.25
1990	54.60	45.40	35.63	9.77
1991	52.94	47.06	35.70	11.36
1992	48.09	51.91	38.04	13.87
1993	43.13	56.87	38.36	18.51
1994	40.80	59.20	38.80	20.40
1995	33.97	66.03	36.59	29.44
1996	31.00	69.00	35.00	34.00
1997	31.62	68.38	38.11	30.27
1998	28.24	71.76	38.41	33.35
1999	28.21	71.79	35.37	36.42

资料来源:1978~1994年数据根据《1978~1994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中国的道路》表12归并得出,1994年后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资料计算得出。转引自张杰《经济变迁中的金融中介与国有银行》,P63。

在国有商业银行系统控制了绝大部分金融资源,并持续不断地为体制内成分提供金融补贴的条件之下,体制外的增长又从何处获得金融支持呢?通过对现有统计数据的归纳,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非国有企业的增长主要依赖内源融资来获得自身增长动力^①。参见表二。

表二 中国1985~2000年金融机构对非国有部门的贷款份额(%)

年份	城市 集体	城市 个体	乡镇 企业	三资 企业	农 业	全 部 非国有部门
1985	4.95	0.17	5.63		6.85	17.60
1986	5.11	0.13	6.82		6.68	18.94
1987	5.47	0.16	7.25		7.28	20.16
1988	5.58	0.17	7.59		7.19	20.53
1989	5.15	0.11	7.39		7.12	19.97
1990	4.93	0.09	7.42		7.17	19.61
1991	4.74	0.08	7.63		7.39	19.84
1992	5.77	0.26	7.16		7.54	20.73
1993	5.96	0.33	8.22		6.47	20.98
1994	5.08	0.38	*	1.94	11.38	18.78
1995	4.26	0.39		1.98	5.99	12.62
1996	4.31	0.46		2.20	11.65	18.62
1997	11.10	0.52	6.72	2.52	4.42	25.28
1998	9.74	0.55	6.45	2.87	5.14	24.76
1999	10.72	0.62	6.57	3.19	5.11	26.21

* 1994~1996年乡镇企业贷款被包含在农业贷款项下

资料来源:1985~1991年数据转引自麦金农(1993)《经济市场化的次序》,表13.9;1992~1999年的数据根据《中国金融展望》(1994~2000年)有关数据整理得出。

①体制外经济在发展之初偏重于扩大劳动力投入,因为对非国有经济(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而言,劳动支持更容易获得,成本也更低。正是由于非国有经济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劳动密集型的投入结构,而这种投入结构的需要的配套资本要求又相对较低,因此,自筹资本的内源融资方式才得以支持其发展。这一特点使体制外经济成分在发展初期对外部金融支持需求有限,不与体制内成分的金融补贴构成竞争。关于乡镇企业的发展特点,参见李稻葵“转型经济中的模糊产权理论”,《经济研究》,1995,(4);关于农业发展的经济资源支持,参见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尽管劳动力投入的扩大推动了非国有部门在改革初期在一个相当小规模的外源融资支持下不断获得增长,并为改革的继续推进提供了收益动力;但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市场的逐渐建立成熟,非国有部门的这一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具体而言,随着劳动力投入的不断增长,其边际回报日益下降;而市场的建立又使大量同类企业纷纷涌现,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随之不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非国有部门既有的劳动密集型和粗放扩张的增长模式越来越显示出局限性。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使生产过程中技术含量的提高成为必要;而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就必然要求加大资本投入(包括人力资本技术水平提高和货币资本投入加大),原先扩大再投入的主要来源的内源融资此时已无法满足日益增大的资本投入要求,这就对外源融资规模提出了新的要求。这要求在原有商业银行垄断信贷资金的条件下是无法获得满足的,作为协调既有金融体系与经济继续发展之间矛盾的利益相关者,地方政府开始发挥其作用,推动金融深化展开。

对地方政府而言,非国有部门的继续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一增长解决了其“增加收入、扩大就业以及扩张财政能力,甚至政府官员个人目标叠加而成的综合目标”^[31],一旦体制外成分发展因资本融通短缺而受阻,地方政府将迅速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一般来说,地方政府通过两种渠道为体制外企业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其一,在既有制度框架下扩大投资,包括直接出资,也包括通过各种手段对国有商业银行施压,令其扩大对非国有部门的金融支持;其二,寻求金融深化,突破国有商业银行垄断,建立符合地方发展利益的中小商业银行。简言之,体制外产出继续增长对金融支持(外源融资)需求的逐步增加内生出了体制外金融制度因素的成长,这成为我国中小商业银行在1980年代末期及1990年代初期纷纷涌现的根本原因。1986年交通银行成立,打破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那时还称为专业银行)的垄断局面,同年,全国第一家城市信用社(即后来的城市商业银行)也在武汉诞生。1987年,第一家由企业集团发起设立的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出现,第一家由地方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出资的区域性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也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嗣后,其他一批主要受到地方政府支持而建立起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纷纷出现,包括广东发展银行(1988年)、招商银行(1986年)、兴业银行(1988年)等。另一方面,城市信用社在1987~1991年间得到巨大发展,至1991年,城市信用社已遍及全国各主要城市。1992年,各地城市信用社联社成立,标志着城市信用社已初步形成体系,开始成为

影响全国金融资源配置的一个因素。

三、金融深化和中小商业银行发展

众所周知,衡量一国金融深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其国内金融机构的多样化程度,因为只有多样化的金融机构体系才能从不同层面满足经济个体的融资需求,保证社会资金盈余部门的资金流向更有效率的资金需求部门。我国中小商业银行的诞生和发展正是金融深化的一个体现,它是适应经济市场化对金融深化进程提出的要求而出现的。

如上所述,体制外增长的继续对外源融资提出越来越大的需求,地方政府尽管可以通过既有制度框架下的努力来部分满足这一需求,但这一解决办法只是权宜之计: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量有一个既定上限,它必须严格小于本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相应的,其财政支出对本地体制外成分的支持也受到很严格的预算约束,这与相对体制外成分迅速增长的融资需求显然存在巨大的差额。当然,通过各种方式对国有商业银行施压,以迫使其将信贷资金更多投向体制外企业,也是在既有框架下寻求问题解决的一个办法,但这涉及资金的投向匹配和效率问题。

与国有大型企业建立起来的长期信贷关系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形成很强的业务惯性和沉淀成本,这就使得一旦它们转而与体制外中小企业发生信贷关系,便要支付额外的信用评估费用和监督成本,就社会整体而言,大大提高了资金融通过程中发生的费用,降低了融资效率;不仅如此,还造成国有商业银行规模的超边际扩张,进一步影响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运作效率。于是,尽管地方政府采取较强的激励措施去压制国有商业银行对体制外成分提供信贷,但这一信贷供给形式因不适应体制外产出的金融需求而始终无法获得实质性增长。张军(1997)

和史晋川(1997)的实证研究表明,体制外产出的金融支持主要来自于民间金融部门(正式和非正式的),而非官方的正规金融部门^[4-5]。不仅我国如此,世界银行(1989)在对发展中国家40年(1948~1988年)里农村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考察中发现,政府通过引进正规金融制度向民间提供廉价信贷的努力大多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它们所需要的金融对正式的金融机构来说可能太小,因为许多贷款或接受一项贷款的费用是与交易数额的大小无关的。正式的金融机构在乡村和小城镇开办分支机构费用,往往与由此引起的业务不相适应”^[6]。从金融

深化与发展的角度看,只有内生于非国有经济内部的金融制度安排才是最适应其融资需求的,因为这些部门金融成长的真正要素存在于本部门的经济流程之中。朱玲(1995)的研究表明,1980年代末期乡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等)“以其实行民用民管的制度优势将村民的储蓄与借贷活动联系在一起,有效地实行贷款监督,既以低廉的交易成本给予农户获得小额贷款的机会,又保障本机构的贷款得以收回,为解决这一对长期困扰正规金融组织的难题找到了途径。这有可能成为乡村基层社会继农村生产责任制之后又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7]。史晋川等(1997)的实证研究则表明,城市信用社同样发挥了这一优势:在民营小型企业占主导地位的浙江路桥,国家四大商业银行存款仅占总存款的32.67%,占总贷款的25.79%;而民间的金融机构(城市与农村信用社)的占比分别为67.33%和74.21%。

四、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体制内成分获得稳定的国有银行信贷资金支持,从而保证了渐进式改革的顺利进行。但随着增量改革的推进和体制外经济成分增长模式的转变,其对金融资源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能否满足它们的融资需求,成为决定改革能否继续推进的重要因素。于是,经济的发展变迁对既有金融约束政策形成了改变的压力,它要求推动金融深化进程,构建起与体制外成分相适应的体制外金融机构。我国中小商业银行的创生和发展正是基于这一逻辑得以展开的,它既是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也是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变迁的客观要求。

(责任编辑:鄢庆英)

(责任校对:鄢庆英 王勉)

参考文献:

- [1] JR.麦金农.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第二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2] 张杰.经济变迁中的金融中介与国有银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3] 陈剑波.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及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J].经济研究,1995,(9).
- [4] 张军.改革后中国农村的非正规金融部门:温州案例[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
- [5] 史晋川等.市场深化中民间金融业的兴起——以浙江路桥城市信用社为例[J].经济研究,1997,(12).
- [6] 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金融体系与发展[R].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 [7] 朱玲.有感于农村金融机构的重组与分设[J].改革,1995,(4).
- [8] 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9] E.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 [10] JR.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11] 李稻葵.转型经济中的模糊产权理论[J].经济研究,1995,(4).
- [12] 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